

周召公與文王家族關係的文獻考察*

蔡 佩 玲**

摘 要

傳統文獻對周初重臣召公與文王家族的關係有若干紀錄，但彼此矛盾，歷代學者因而提出「與周同姓」、「文王之子」、「周公之兄」等說。銅器銘文提供傳統文獻未見的線索，反而使召公出身的辯論更加複雜。源自傳統文獻的疑問，輕易與出土文獻牽連參合，反而治絲益棼，因為傳統文獻的流傳、重編和詮釋複雜，在採用之前應仔細分辨。本文嘗試解析傳統文獻所載有關召公出身諸說法的形成過程，指出某些說法有疑之處，為往後研究此問題提供新的論述基礎。

本文分析諸說形成的先秦至東漢時期，與召公有關的傳統史料反映的親屬關係，指出召公與文王家族關係在先秦文獻中並不清晰，直到西漢中期仍是「與周同姓」。「文王之子」、「周公之兄」等說出於東漢，應源於儒者誤讀文獻導致的錯誤認知。

關鍵詞：召公、文王家族、親屬關係、漢代經學、古史建構

* 本文寫作受陳昭容先生、閻鴻中先生指正與黃怡君、歐陽宣、王詩涵等學棣協助甚多，特此致謝。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ke Shao and the Family of King Wen of Zhou in Transmitted Texts

Tsai, Pei-ling*

Abstract

There are various accounts in transmitted texts reco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ke Shao, an influential figure in the early Western Zhou, and the family of King Wen of Zhou. However, since these accounts contradict each other, scholars have proposed explanations, such as “having the same surname as the Zhou kings,” “the son of King Wen,” and “the brother of Duke Zhou.” While the unearthed bronze inscriptions provide us with new leads, they instead complicate the debate of Duke Shao’s origin. Any careless application of inscriptions to solve problems derived from transmitted texts would only cause more difficulties because the circulation, compi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ed texts are complex. Hence, it requir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ransmitted texts before any attempt to incorporate bronze inscriptions into research. This article is intended to investigate the formation of the various narratives related to the origin of Duke Shao and point out that some narratives are questionable, thereby to lay a new foundation for any further discussions.

By analyzing the familial ties of Duke Shao recorded in the texts dated from the pre-Qin to the Eastern Han period,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ke Shao and King Wen’s family was not clearly stated in the pre-Qin texts. The narratives remained “having the same surname as Zhou kings” even in the middle Western Han. Stories like “the son of King Wen” and “the brother of Duke Zhou” only appeared as late as in the Eastern Han, probably resulting from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Confucian scholars in their misreading of the transmitted texts.

Keywords: Duke Shao, the family of King Wen of Zhou, kinship,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 the Han dynasty,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TU), Taiwan

壹、前言

周初聲名顯赫的重臣召公（生卒年不詳）與文王（生卒年不詳）家族的關係，傳統文獻有若干紀錄，但彼此矛盾。與召公有關的銅器銘文的族群特徵，不僅無法解決傳統文獻的矛盾，更加深了問題的複雜性。

召氏是姬姓，這在傳統文獻與青銅器銘文都得到印證，¹傳統文獻更將召氏與文王家族緊緊繫連，以召公為文王之子，屬姬姓周族的核心成員。但出土資料卻顯示召氏與其支族燕國國君家族具有姬姓周人一般不具有的商文化特徵。有關召公的青銅器表明，召氏與燕國國君家族使用日名與族氏銘文，²這是商文化習俗，姬姓周人一般不使用。³ 召氏為什麼保有與其他姬姓周人截然不同的文化習慣？學者結合甲骨文、金文和傳統文獻，曾提出多種假說。如白川靜認為，召氏是甲骨文中的「召方」，原先歸順商人，後來與周人合作。⁴ 張懋鎔則認為，召公一支是在周克商之後東進的周人，因與商人混居，難免受其影響。⁵ 任偉以為，召氏是較早期就東遷的周族，可能就是甲骨文中的「召方」。⁶ 韓巍提出的解釋較為曲折，他指出：甲骨文中「召方」之「召」，按其字形實不應釋為「召」；甲骨文另有「召地」，其召字寫法才與召氏之「召」相近。他認為召地當在山西垣曲縣（依陳夢家說），⁷故

¹ 《左傳》昭公七年「燕人歸燕姬」，哀公五年「齊燕姬生子」，《史記》記召公「姓姬氏」，〈燕侯簋〉(03614)「燕侯作姬承尊彝」，足見燕國國君一系為姬姓。銅器銘文概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4日。

² 傳世青銅器銘文如〈燕侯旨鼎〉(02269)「燕侯旨作父辛尊」，〈伯穌鼎〉(02407)「伯穌作召伯父辛寶尊鼎」，洛陽北窯墓地出土的〈叔尊〉(NA0349)「叔造作召公宗寶尊彝。父乙。」銘文中「父辛」、「父乙」是以親屬稱謂領日名的形式稱呼先人，是典型的商文化特徵。著名的梁山七器之一〈帶鼎〉(02157-02159)「帶作尊彝。太保。」太保兩字獨立於銘文本文，也與商人典型的族氏銘文風格相同。上述銅器銘文概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4日。

³ 張懋鎔整理青銅器銘文中能確知族屬者，指出能確認為姬姓周人所作的青銅器，基本不使用「日名」與「族徽」（即族氏銘文），並提出「周人不用日名」與「周人不用族徽」說。此說適用多數狀況，但也有如召公、應侯這類不易解釋的例外。張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說〉，《歷史研究》，第5期(1993)，頁173-177；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說〉，《考古》，第9期(1999)，頁835-840；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日名說」〉，《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3輯（北京：科學，2010），頁23-26；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族徽說」〉，《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3輯，頁27-30。

⁴ （日）白川靜，〈召方考〉，《甲骨金文學論集》（京都：朋友書店，1973），頁171-203。

⁵ 張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說〉；〈再論「周人不用日名說」〉。

⁶ 任偉，〈西周封國考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66-169。

⁷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頁260。

召氏可能是原先居於豫西、晉南而臣服於商人的部族，後來服屬於周人，得賜予姬姓。⁸ 異說紛陳，正是因為各種線索彼此矛盾，難有確解。

傳統文獻對召公與文王家族關係的記載也有矛盾。《史記》說召公是「周之同姓」，《白虎通義》說召公是「文王之子」，西晉皇甫謐（215-282）《帝王世紀》云召公為「文王庶子」，後世學者如孔穎達（574-648）、陸德明（556-627）、顧棟高（1679-1759）各自支持一說，或是提出異說，沒有共識。在更多文字資料，如青銅器銘文面世後，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細究起來，甲骨文、金文和傳統文獻中的相關史料各有疑問，輕易牽連參合反而治絲益棼，實有分別釐清的必要。傳統文獻的流傳、重編和詮釋複雜，與金文等當世材料性質不同，在採用傳統文獻之前應仔細分辨。本文以傳統文獻中召公與文王家族關係諸說的流傳演變為題，先分析先秦時期與召公有關史料反映的親屬關係，接著按各說出現的時代先後，依序析論該說可能的依據與影響，並說明召公與文王家族的關係從模糊到清晰、與周王室關係從疏遠到親近的過程，不足之處尚祈方家指正。

⁸ 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頁85。

貳、先秦的模糊記載與《史記》「與周同姓」說

言及召公親屬關係的傳統文獻，最早是《逸周書》的〈祭公〉與〈作雒〉。從語法來說，〈祭公〉與金文近似，保留較多西周的樣貌，原篇應成於西周時期，⁹後人調整了個別字詞，改動不多；¹⁰〈作雒〉中有關數字的概念與戰國時興起的思想相近，可能是戰國時寫定，最早不過春秋。¹¹保守地說，兩者反映的歷史訊息不晚

⁹ 李學勤比對〈祭公〉篇與西周金文，認為此篇成於西周時；李氏後再指出，〈祭公〉與〈師詢簋〉(04342)的語句文例有多處相似，兩者應是時代相近的篇章。〈師詢簋〉銘文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4日。黃懷信考證《逸周書》諸篇成書年代時承襲李氏之說。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第3期(1988)，頁7-10；李學勤，〈師詢簋與《祭公》〉，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2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70-72；黃懷信，《《逸周書》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頁120。

¹⁰ 〈祭公〉本文與西周金文的語言習慣近似，但有部分字詞未見於西周金文，如「三公」，過去學者理解為「三公制」的三公，經比對簡本，可知傳世〈祭公〉中「乃詔畢桓于黎民般」應是「乃詔畢桓、井利、毛班」，「三公」是稱呼此三人。有學者依舊認為這是西周已有三公制的證據，但祭公稱畢桓、井利、毛班為「三公」，祭公不在「三公」之列，而以穆王與祭公對談的內容可知祭公的地位相當高，應是執政大臣，卻非「三公」。學者為了解決此矛盾，沈建華認為此是祭公向穆王推薦「三公」人選，但若只是薦舉，三人尚未就職，不能將此「三公」看作三公制的三公；杜勇將「三公」視為一個概括的觀念，統稱天子的輔佐之臣，不是實指三人，此說太迂曲，可信度不高。李學勤認為三公只是稱畢桓、井利、毛班，不是當時有「三公制」的證據，此說較穩妥。沈建華，〈清華楚簡《祭公之顧命》中的三公與西周世卿制度〉，《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2010)，頁379-404；杜勇，〈清華簡《祭公》與西周三公之制〉，《歷史研究》，第4期(2014)，頁4-20、189；李學勤，〈清華簡《祭公》與師詢簋銘〉，楊朝明主編，《孔子學刊》，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2011)，頁12-134。除了「三公」是簡文訛誤造成誤讀，有字詞在金文裡幾乎未見，如「大夫」一詞未見於西周金文，最接近的是〈小孟鼎〉(02839)「三事大夫」，但「三事大夫」應是官職名，與〈祭公〉中指某等級的貴族群體不同，此「大夫」可能是後世增添。另外，有些字或詞用法與西周金文仍是相同的，但改成後來習用的字，如西周金文常用「卿事」、「余」，傳世〈祭公〉作「卿士」、「予」。〈小孟鼎〉銘文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4日。周玉秀，《《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86-150。

¹¹ 楊寬認為，早期都城的外郭沒有城郭建築，〈作雒〉「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邠山，以為天下之大湊」，是利用天然山川，並加工連結作為防禦設施，正是早期都城的特徵，故〈作雒〉乃西周篇章。趙光賢根據〈作雒〉中三監、武王死年等史事，以及五色配五方、五宮與雒邑的城市設計，指出此篇應為春秋或戰國人偽作。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857-870；趙光賢，〈《逸周書》作洛篇辨偽〉，《文獻》，第2期(1994)，頁267-269。(按：〈作雒〉的年代，當如趙光賢所說，是春秋、戰國時人所作。此篇的文句不古，五色配五方的觀念，起源於春秋，成熟於戰國，《尚書》〈禹貢〉有「五色土」，〈堯典〉「五品」、「五玉」，〈皋陶謨〉「五采」、「五色」、「五長」等以五為數的現象相當明顯，〈作雒〉一篇的年代應與此數篇的年代相近或略晚。王暉整理古籍中數字的使用方法，指出戰國早期以前數字中常用「有」、「又」作為連接詞，〈作雒〉則不用連接詞。由此觀之，〈作雒〉當是戰國時的篇章。楊寬以〈作雒〉為西周作品，西周都城多無城郭，因此認為「郭方七十里」非實體外郭，是依憑山川作防禦設施。「郭方七十里」明言是外郭，「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邠山」是指雒邑的形勢，〈作雒〉當是東周時人追記時，因已不清楚西周城制，無意間摻入東周城制的概念。五色、五方等數詞的研究參見王暉，〈從數詞組合方式的演變看先秦古籍的斷代問題〉，《唐都學刊》，第4期(1996)，頁62-67。)

於戰國時期。〈祭公〉記載，周穆王對祭公謀父說：¹²

朕皇祖文王、列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維皇上帝度其心，寘之明德，付俾於四方，用應受天命，敷文在下；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用克龕紹成康之業，以將天命，用夷居之大商之眾；我亦維有若祖祭公之執和周國，保乂王家。¹³

周穆王回顧文、武受命克商時，周公、召公的輔佐之功，藉以比擬輔佐自身的祭公主持國政、安定國家的貢獻。穆王呼周公為「文祖」、召公為「列祖」、祭公為「祖」，清華簡本作「祖周公暨祖召公」、「祖祭公」，似乎三公都是周王家族的直系先輩。但周公在武王時已另立一族，與周王是關係親近的旁支關係；召公也早就立了召氏；祭公據《左傳》記載，先人是周公之子而別封於祭地，此祭公已是別封後第二代，¹⁴顯然此處之「祖」不是最狹義的直系尊親屬稱謂。穆王對尚在人世的祭公也稱其為「祖」，可知此「祖」是周王對同姓尊長的稱呼。

〈作雒〉的親屬稱謂也是廣義用法：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殂予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¹⁵

此段概述周人甫得天下的政局，乍看「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周公、召公仿若是兄弟關係。然而，此「父兄」是與「諸侯」相對應的詞，並非實指。陳逢衡（1778-1855）的注解認為父兄指同姓，諸侯指異姓，¹⁶也是將此句的「父兄」

¹² 文中周王自言「以予小子揚文武大勳，弘成康昭考之烈」，可知當為周穆王，這也與《國語·周語上》祭公謀父諫穆王征犬戎相符。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9。

¹³ （西晉）孔晁，〈祭公解第六十〉，《逸周書》，（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明嘉靖二十二年本），卷8，頁1-2。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5月3日。清華大學所藏簡亦有〈祭公〉篇，與本文論述有關的一段，其內容、語序與今本相去不遠，不影響本文論述，故不於文內討論。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¹⁴ 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頁9。

¹⁵ （西晉）孔晁，〈作雒解第四十八〉，《逸周書》，（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明嘉靖二十二年本），卷5，頁7。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12日。

¹⁶ （清）陳逢衡，〈作雒解第四十八〉，《逸周書補注》，（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北京愛如生數位

與「諸侯」理解為泛稱，只是將兩者的界線看得過於分明。實際上，周代文獻中不乏這類泛稱的用法，如《詩經·小雅·頍弁》中，便有「豈異伊人？兄弟匪他」、「豈異伊人？兄弟甥舅」等語，「兄弟」、「兄弟甥舅」同是廣泛稱呼與周王同姓或有著婚姻聯繫的異姓之人。¹⁷ 芮逸夫研究周王在正式場合對諸侯的稱呼，指出周王對諸侯使用「兄」、「弟」、「甥」、「舅」等稱呼時，時常是用以強調彼此的親誼，是泛稱而不是真正的親屬關係。¹⁸ 可見周人會隨著場合使用親屬稱謂的廣狹義。〈作雒〉的「父兄」，從上下文的歷史脈絡看來，應理解為對關係較近的宗族與姻親的泛稱，與後文「諸侯」恰成對比，「內」、「外」更點出「父兄」、「諸侯」是指稱親疏不同的人群。「父兄」既然是泛稱，周公與召公的關係未必非常緊密。

約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富辰勸諫周王的一段話，也使用「兄弟」稱呼同姓宗族之人：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¹⁹

周襄王的大夫富辰說召穆公「思周德」而糾合宗族，則「宗族」是姬姓周人；召穆公可以糾合宗族，可見召氏確實屬於姬姓周族，只是與周王室的親緣關係不明。

上文討論先秦文獻與召公出身有關記載，資料相當少，且對召公與文王家族的

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嘉慶道光間江都陳氏裒露軒刊本），卷 12，頁 5。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¹⁷ 《詩經·小雅·頍弁》一章，毛詩序認為是諸公刺幽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陳延傑認為是「王者燕兄弟親戚」。無論何者為是，都不妨礙將此處的「兄弟甥舅」等親屬稱謂理解為泛指與周王同姓的族人。（東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73，據校相台岳氏本影印），卷 14，頁 7。

¹⁸ 芮逸夫〈釋兄弟之國〉核心論點是「兄弟之國」與「同姓之國」的差異與混用現象，並延伸論及「諸父」稱謂；〈釋甥舅之國〉是討論中國「甥舅」稱謂使用時的複雜性及其形成原因的多重。兩文的論述重點都不是分析文獻中使用稱謂的指涉內涵，但其指出的現象，有助於理解中國古代文獻中親屬稱謂的使用。芮逸夫，〈釋兄弟之國——兼論中國古代諸父的稱謂〉，《清華學報》，新 2 卷 2 期（1961），頁 77-90；〈釋甥舅之國——兼論中國古代甥舅的稱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30 本上冊（1959），頁 237-258。傳統文獻常見周王在會面時稱呼同姓諸侯為祖為父，金文少見，可能是因為金文中提到尊長時，往往與祭祀有關，如「作父某寶尊彝」，或是追述家族史，如〈牆盤〉（10175）、〈逯盤〉（NA0757），使用親屬稱謂的最狹義；會面時的對話，如〈毛公鼎〉（02841），周宣王便稱毛公「父曆」，使用親屬稱謂的廣泛義。上述銅器銘文概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4 日。

¹⁹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420-424。

關係語焉不詳，較肯定的是召公屬於姬姓周族。

今日能見的先秦史籍數量極少，西漢司馬遷（145B.C.-?）《史記》是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參考資料，²⁰〈燕召公世家〉一條關於召公的記載，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²¹太史公將召公與周看作兩個不同的族，而同姓姬。相較於此，〈魯周公世家〉就直言「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管蔡世家〉亦說「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衛康叔世家〉「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晉世家〉「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史公說周公等人乃「文王子」、「武王弟」，卻言召公「與周同姓」，區別相當明顯。《史記·管蔡世家》更明確列出武王同母兄弟十人：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²²

當中沒有召公奭。班固（32-92）《漢書·古今人表》承此說。

綜上所述，無論是《逸周書》、《左傳》、《史記》或《漢書》的相關記載，其實只說明召公應為姬姓或姬姓周人，並未提到他與文王的關係。

²⁰ 先秦典籍今日得見者稀少，不僅焚書造成重大損失，典籍傳鈔不易，容易失傳，如劉歆《七略》時尚存者，至《漢書·藝文志》時已有部份典籍餘目而無書，可見書籍失傳之速。太史公當時能見書籍必較今日留存為多，故其雖然未能見甲骨，卻能傳商王世系，顯然當時還留有相關資料，以資太史公綜述古史。且司馬遷寫史有其法度，於疑處傳疑，信則傳之，因此《史記》中的先秦篇章成為研究古史的重要參考材料。

²¹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燕召公世家第四〉，《史記》，（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 34，頁 1。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2 日。

²²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管蔡世家第五〉，《史記》，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 35，頁 1。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2 日。

參、「文王之子」說

漢代除了上節所論《史記》、《漢書》的「周之同姓」說，也出現召公乃文王子的說法，其源起可能是《穀梁傳》對燕國所從出的記載，²³「燕，周之分子也。」²⁴此句出自莊公三十年，背景是齊侯伐山戎。《穀梁傳》認為山戎為亂，使身為周之分子的燕國不能守職貢之責，故齊侯討之。「分子」是個多義詞，此處意義為何，有些含糊。《穀梁傳》的註解傳統裡，晉代范甯（339-401）《集解》認為「周之分子」指「周之別子孫」，陸德明《經典釋文》從之，可說模糊帶過，並沒有明白解釋實際的關係；唐代楊士勛（生卒年不詳）的《疏》則說：「燕與周同姓，故知別子孫也」，依《史記》、《漢書》解《穀梁傳》。²⁵上述理解較《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更強調召公與周族的血緣關係。

相較於周至西漢文獻的曖昧說明，東漢時期的《白虎通義》、《論衡》給了召公明確的身分：

《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²⁶

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

²³ 《穀梁傳》成書年代較晚，其確切年代學者們有不同意見。余嘉錫以《新語》曾引《穀梁傳》文而將《穀梁傳》著於竹帛的年代置於漢初；程元敏則認為《新語》乃偽書，他據《漢書·儒林傳》，主張穀梁學在武帝之前尚是口傳，武帝時才由瑕丘江公寫成。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526-531；程元敏，《先秦經學史》下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頁1232-1235。學者對《穀梁傳》的年代雖有不同意見，其成書年代不早於西漢應無疑問。成書雖較晚，其前當經歷一段較長的口傳過程，其中應有較早的史料。因其成書年代已經到了西漢，當中容或摻雜漢人的習慣用語與對史料的理解，因此仍將《穀梁傳》的資料視為漢代史料。

²⁴ （東晉）范甯集解，（唐）陸德明音義，〈莊公第三〉，《春秋穀梁傳》，（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宋本），頁20。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²⁵ （東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影印），卷6，〈莊公〉，頁64。任偉也解讀為周的支族。任偉，《西周封國考疑》，頁160-170。

²⁶ （東漢）班固，〈王者不臣〉，《白虎通德論》，（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元大德覆宋監本），卷6，頁2。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²⁷

經學經過西漢一代的發展，即使師出同門，對同一問題往往因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而有不同說解，衍生出不同家法，至東漢時，專精章句的今學發展日益蓬勃，雖有師承而各有家法，且章句煩黷，²⁸因此章帝（57-88）下令於白虎觀講議，讓博士們對特定問題進行辯論，最後由章帝判定高下。《白虎通義》即是班固以白虎觀講議的內容寫成，書中所涉多是不同家派各有意見的問題，而其中的任一段落都至少代表東漢時期某一家派的思想。

《白虎通義》「王者不臣」的「論子為父臣異說」條，論子可以為父臣，因不遺善，接著引《詩經》「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為子可為父臣之證，「召公，文王子也」乃是對該證據的補充說明。²⁹「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出自《詩經·大雅·江漢》：「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³⁰此章周王勉勵召伯虎要學習其先祖召公，如同召公維護文武的事業一般，致力於鞏固周的統治。除了召公是文武的股肱大臣，再難看出其他關係。《白虎通義》此處引《詩經》來證成「子可為父臣」，是已經預設召公為文王子，但未言根據為何。

《白虎通義》稱引詩句的出處，歷來有不同意見，如阮元（1764-1849）將書中沒有明指出處的詩句都視為魯詩，³¹陳喬樞（1809-1869）認為《白虎通義》以召公為文王子是魯詩之說，《漢書·古今人表》的召公為周之同姓為齊詩之說；³²馬

²⁷（東漢）王充，〈氣壽篇〉，《論衡》，（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卷1，頁14。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²⁸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158-231。

²⁹（東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頁267。

³⁰（西漢）毛亨，〈江漢〉，《毛詩》，（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宋本），卷18，頁23。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³¹（清）阮元，〈魯詩〉，《三家詩補遺》，（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儀徵李氏刻崇惠堂叢書本），頁50。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³²（清）陳壽祺、陳喬樞，〈齊詩國風一〉，《齊詩遺說考》，（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刻左海續集本），卷1，頁23-24。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國翰（1794-1857）則將《白虎通義》未明言出處的詩都看作齊詩。³³ 以為是齊詩者，認為班固家學齊詩，以為魯詩者，則是因白虎觀講議時，有習魯詩的名儒在座，掌承制問難的魏應亦習魯詩。³⁴ 《白虎通義》引〈江漢〉此章，於毛詩與魯詩是相同的，此處單憑引詩無法辨別是某家詩學獨有的說法。況且，班固於《漢書·古今人表》言召公為周同姓，若因班固習齊詩，就認為《白虎通義》的召公為文王子乃齊詩之說，就與《漢書》相矛盾。以「文王子」、「周之同姓」為齊詩、魯詩學的詮釋差異，難以成立。

第二條引文出自《論衡》，該書主要內容是王充（27-?）對古代典籍中諸多疑點的質疑，王充學問廣博，於諸經之外，亦博通諸子百家。³⁵ 前引《論衡》〈氣壽〉篇分析古人壽命之理，認為人之壽當為百年，與召公有關一段是用古人的壽命證成此說。在王充的論述中，文王一家皆長壽，武王、周公、召公為兄弟行，生年相去未幾，而召公活躍至康王時，故知其壽綿長。召公為周公之兄一語，在此處為加強論述之用，召公、周公是兄弟已經是論證前提。《論衡》以召公為周公之兄，可能是根據《穀梁傳》與《白虎通義》再加以發揮而來。

影響王充判斷的，除了《穀梁傳》與《白虎通義》外，頗疑《尚書·君奭》的異文可能也起了作用。《尚書·君奭》的末段：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³⁶

于省吾認為「朕允」之「允」為「兄」字之訛，其根據是《三體石經》〈無逸〉篇「允若時」作「兄若時」，以及《白虎通義》、《論衡》以召公為周公之兄的兩條例證，³⁷顧頡剛與劉起鈞同意此說。³⁸ 若于氏改字可信，則此段便是周公、召公為兄

³³ （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第1冊，頁495。

³⁴ 關小彬，〈白虎通義引《詩》、說《詩》考〉，《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8），頁33。

³⁵ 王充曾受業於太學，又師事班彪，並通眾流百家言。（南北朝）范曄，（唐）李賢等注，〈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後漢書》，（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百衲本景宋紹熙刻本），卷49，頁1-2。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5月3日。

³⁶ （西漢）孔安國，〈君奭第十八〉，《尚書》，（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宋本），卷10，頁4。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³⁷ 于省吾，《雙劍謬尚書新證》（臺北：崧高書社，1985），頁231-232。

弟行的明證。屈萬里在《尚書異文彙錄》中也列出《三體石經》中《尚書》〈無逸〉「允若時」與〈君奭〉「朕允」的「允」作「兄」的異文，³⁹但屈氏在《尚書集釋》並不採「兄」字。

屈萬里未明言不從異文的理由，但我們可推知一二。第一，改允為兄，「朕兄」尚可理解，「予不兄惟若茲誥」則讀不通；第二，〈無逸〉「厥愆，則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允若時」改「兄若時」是讀不通的。以「允」為「兄」字之訛，於「朕兄」雖可說通，但「予不兄惟若茲誥」費解，因此于省吾讀「予不兄」為「予不皇」，皇有暇義，「予不暇惟若茲誥」，讀來文義尚稱通順，但卻要輾轉解釋；又，藉三體石經〈無逸〉的異文改〈君奭〉之「允」為「兄」，而在三體石經真正作「兄」的〈無逸〉，顧頡剛與劉起鈇則從舊說不改字，改字標準不一。于省吾于〈無逸〉則無說。《尚書·無逸》異文未為後世學者採信，現在通行的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版本於《尚書》使用了《開成石經》、《臨安石經》、宋刊本等版本校勘，⁴⁰日本學者山井鼎用早於唐的足立學校藏古抄本校經書，⁴¹兩者都未提到《尚書》此處有異文，顯然三體石經之後的諸版本都不採此異文。字形訛誤並不罕見，單憑他篇異文與較晚的說法改動文字，使原先文從字順的釋讀必須輾轉解釋，不甚妥當。

于省吾又說，此處若不改字而讀「允」為「信」，下文又說「不允」，前後矛盾。⁴²但「予不允惟若茲誥」並非與「朕允」相應，而是與「予惟曰：『襄我二人』」對比。「予不允惟若茲誥」與後文「予不惠若茲多誥」及〈酒誥〉「予不惟若茲多誥」句式相似，意義相近，⁴³「允」修飾提示重點的「惟」，與下文「予惟曰：『襄我二人』」形成對比句，⁴⁴乃加強肯定內容，並非與「朕允」呼應。

³⁸ 顧頡剛、劉起鈇，《尚書校釋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587-1588。顧頡剛、劉起鈇全盤接受了于省吾的意見，因此下文僅論于省吾的意見。

³⁹ 屈萬里，《尚書異文彙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頁119。

⁴⁰ 屈萬里，《書僞論學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頁216-236。

⁴¹ （日）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第190冊，頁4-7。

⁴² 于省吾，《雙劍謄尚書新證》，頁232。

⁴³ 雷燮仁，〈《尚書》字詞零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14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12日。

⁴⁴ 郭維茹，〈今文《尚書》「惟」字分裂句初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5期（2016），頁154-155。

除卻改字後的釋讀問題，司馬遷於〈燕召公世家〉曾引部分〈君奭〉，內容與今日〈君奭〉大體相同，可知司馬遷當時曾見〈君奭〉，而仍說召公與周同姓，不說與武王是兄弟，若非當時他所見〈君奭〉的「允」字不為「兄」，即是司馬遷亦不信從該說。

如從全文的說辭安排觀之，〈君奭〉是周公對召公說明自己無貳心，全文以敬稱「君」稱召公，此處以官職「保」稱之，更是慎重，⁴⁵以引出下文召公與周公同擔重任之辭，如此莊重謹慎之語，若開頭以「朕兄」表示親近，顯得不倫不類。故〈君奭〉「朕允」不當改為「朕兄」。

清代學者皮錫瑞（1850-1908）考證《尚書》時亦留意了召公出身說法的矛盾，他認為，召公是文王子應是今文家之說，召公身世諸說可能是不同學派的見解。⁴⁶ 皮錫瑞注意到召公為文王子之說是漢代才出現的說法，正合於本文對相關史料的分析，但其將《白虎通義》、《論衡》視為今文家的說法，恐怕不盡其實。據錢穆對兩漢經學的研究，東漢古學與今學的區分，在於為學的態度與方法。今學重章句、守一家之師法，而古學不受此限，往往博通群經，重訓詁。⁴⁷ 《白虎通義》因講議時集結了多位今學大家，歸於今學尚稱有理；王充之為學則不能歸入今學，其人博學，論議常引《左傳》，說經不拘成說而多出己意，反倒近於古學。因此「召公為文王子」一說，應非特定學派的見解，而是當時諸儒通說。

顯然，召公的身份之說，在東漢時有一轉折。這個轉折是怎麼來的？寫定於西漢時期的《史記》未說召公是文王子，顯然至少在西漢時期，人們仍清楚召公並不屬於文王家族。這個轉變大概就發生在西漢晚期到東漢初期之間。疑「召公，文王子也」一說不是受單一因素影響，下文試提出可能因素。其一，周初重臣能與召公比擬者，除了異姓的齊太公之外，只有周公與受成王託孤的畢公。周公是武王母弟，畢公應當是文王之子，⁴⁸在《尚書》諸篇記載周初史事的文獻中相當活躍的召公，

⁴⁵ 孫星衍已指出「保奭」是周公刻意言及召公官職，以引出下文召公與周公同擔大任。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456。

⁴⁶ （清）皮錫瑞，〈君奭第二十一〉，《今文尚書攷證》，（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光緒刻師伏堂叢書本），卷21，頁2。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⁴⁷ 錢穆，〈兩漢博士家法考〉，頁208-212。

⁴⁸ 《史記》說畢公也是「周之同姓」，但《左傳》富辰數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故畢公與召公狀況不同，

與文王、周公為親屬，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其二是《穀梁傳》「燕，周之分子」與秦漢時人以「分子」為出分之子的混淆。⁴⁹西漢時期的文獻如《史記·平準書》「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⁵⁰《漢書·賈誼傳》引賈誼（200B.C.-169B.C.）之作「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⁵¹都提到分家是「出分」。這兩例「出分」都是即身出分，如「推恩分子弟」也是諸侯王分諸子，未見出分數代之後，還稱出分自某。即是說，「某出分」指的是「某」本人出分。東漢漢安二年（143）的〈北海相景君銘〉曰「鶚梟不鳴，分子還養」，⁵²稱出分之別子為「分子」，可見在東漢，「出分之一子」可逕稱「分子」。東漢儒者可能因此以為「燕，周之分子也」是指燕國分封是「別子出分」，乃以為受封的召公係文王之子出分。⁵³清代惠棟（1697-1758）《九經古義》就說：「卅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為王子，謂之別者，別于世子也。」⁵⁴雖然惠棟之說已到了清代，但漢代產生誤讀的可能性還是相當高。除了字詞理解的差異之外，西漢時期，太子以外的皇子必要受封諸侯，⁵⁵可能也無形中加強了將「燕，周之分子」解釋為燕國是「文王之子召公出分」的心理。⁵⁶

綜上所述，召公的身世在西漢之前都是「與周同姓」或是「周之分子」，也即是說，西漢之前的諸說，僅言召公與周文王一支有親戚關係，但沒有明確證據說明

應另作個案研究。

⁴⁹ 此說為閻師閱讀拙文時提出的意見，特此說明，示不掠美。

⁵⁰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平準書〉，《史記》，卷30，頁10-11。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⁵¹ （東漢）班固，〈賈誼傳〉，《漢書》，（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48，頁1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5月4日。

⁵² （宋）洪适，〈北海相景君銘〉，《隸釋》，（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三編景明萬曆刻本），卷6，頁10。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⁵³ 今日因琉璃河墓地M1193所出銅器銘文〈克盃〉（NA1367）、〈克罍〉（NA1368）而知實際就封的是召公之子克，此前由於文獻未載，並不知燕國首位封君並非召公。〈克盃〉、〈克罍〉銘文見「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6月19日。

⁵⁴ （清）惠棟，〈穀梁古義〉，《九經古義》，（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5，頁7。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⁵⁵ （日）杉村伸二，〈前漢景帝時期國制轉換的背景〉，《東洋史研究》，第67卷第2期（2008），頁172-178。

⁵⁶ 杉村伸二指出的皇子必須受封為諸侯王現象是西漢時期，本文說「文王之子」說的轉折是在西漢晚至東漢時期，時間看似未能密切相連。但召公親屬關係的資料稀缺，真正的轉折是在東漢時或是西漢晚期，很難說清，因此不能排除該現象對於解釋史料可能造成的影響。

這層關係為何。令人困惑的「文王之子」、「周公之兄」的說法，目前能見的文獻記載，最早出現在東漢，其中《白虎通義》略可代表東漢今文經學通說，而不拘家法的王充《論衡》亦有此說，可見其流行。這個轉變大體發生在西漢後半葉至東漢前半葉，不無可能因為誤讀《穀梁傳》而發生。

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召公為「文王庶子」，左暄認為皇甫謐此說是同時受「文王子」與「周之分子」兩說影響（見附表，編號 29）。皇甫謐之說應當還受《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記載的啟示——召公為文王子，卻不在嫡子之列，則必屬庶子。此後，召公身世的兩派看法莫衷一是，甚至與其他問題結合，衍生其他說法。如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對《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一句的解釋首先提出召公或為黃帝後裔的說法：

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郡。」邵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為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⁵⁷

孔安國、司馬遷與鄭玄說姬姓的黃帝之後所封薊地是燕地，與身世問題難解的姬姓召公正好可以結合，因而衍生出召公為黃帝後裔一說，顧炎武（1613-1682，見附表，編號 6）、朱彝尊（1629-1709，見附表，編號 7）與馬瑞辰（1782-1853，見附表，編號 8）皆以姬姓黃帝之後封薊，當即燕，而支持此說。又如孫星衍（1753-1818，見附表，編號 31）據燕為周之分子與文王之子無召公，認為召公乃文王從子。⁵⁸ 諸說並出，而未能有解。

諸說立基於「分子」、「別子」一詞的解釋，雖然各有訓詁的依據，但是都缺乏足夠的證據。綜合幾項線索言之，文王之子說成立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首先，《史記》斷言召公「與周同姓」，司馬遷對史料的剪裁與取捨相當謹慎，異說而難辨何

⁵⁷（唐）陸德明，〈樂記第十九〉，《經典釋文》，（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抱經堂叢書本），卷 13，頁 6。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⁵⁸（清）孫星衍，〈君奭第二十二〉，《尚書今古文注疏》，（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平津館叢書本），卷 22，頁 1。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者為實，往往於《史記》中兩說並存。謹慎至此的司馬遷在〈燕召公世家〉中沒有留任何模糊空間，直言「與周同姓」，可見當時若不是未見異說，便是異說在太史公眼中不可信。

《尚書》幾篇記載周初史事之文，字句中顯出召公與文王家族的微妙距離。清代學者簡朝亮（1851-1933）指出《尚書·君奭》中周公稱召公為「君奭」不是弟對兄應有的語氣與用詞（見附表，編號 16）；⁵⁹ 程元敏根據《尚書·金縢》，武王病，太公、召公為王占卜，周公對二公以「未可以戚我先王」，指出召公與周公的血緣不甚親近，召公出身當以「周之同姓」說為長。⁶⁰ 他們都指出先秦文獻於細微處呈現的召公與文王家族之間微妙的距離感，這種對話語氣與距離的差異，《尚書》〈康誥〉就與〈君奭〉成強烈對比：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⁶¹

〈康誥〉是武王誥康侯的文書，⁶²王於通篇文告對康侯語氣親暱，不僅時時呼喊康侯名、自稱「寡兄」，更一再叮嚀康侯要「念」、要「敬」，滿溢長兄關懷幼弟之情，與〈君奭〉周公以敬稱「君」貫穿全文，字句謹慎，形成強烈對比。

傳統文獻關於召公身世的資料不明確，《尚書》有關篇章也顯出召公與文王家

⁵⁹ （清）簡朝亮，〈君奭〉，《尚書集注述疏》，（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清光緒讀書堂刻本），卷22，頁3。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⁶⁰ 程元敏，〈尚書周誥十三篇義證〉（臺北：萬卷樓，2017），頁643-644。

⁶¹ （漢）孔安國，〈康誥〉，《尚書》，（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四部叢刊景宋本），卷8，頁1-2、6。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⁶² 屈萬里認為「王」是武王，楊筠如以為是周公奉王命代誥。誥文中無一字提及武王，僅說文王受大命，與〈君奭〉、〈洛誥〉等成王時的誥書總是文王、武王並言有顯著不同。因此，〈康誥〉的「王」為武王的可能性不小。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華岡出版部，1972），頁76；楊筠如著，黃懷信標校，〈尚書叢誥〉（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253。

族並不非常親近，再思及前文所述召氏一族所作銅器，銘文出現日名、族氏銘文等殷商文化色彩，召公為文王子一說成立的可能性很低，與之相關的周公之兄說自不待言。

肆、結論

周初重臣召公，與周公一同輔佐成王，穩定周人的統治，是西周史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召公其人的形象卻顯得模糊不明，相關史料甚至互相矛盾。本文所論召公與文王家族關係，傳統文獻即有不一致之處，致使後世學者諸說紛陳；出土文獻不僅未能解決問題，反而使問題更加複雜。本文依諸說年代先後，析論各說反映的召公親屬關係，與該說成因，並指出召公出身有隨時間越後，說法越清晰的現象。

現今可見的周至西漢文獻中，召公與文王家族的關係並不明確，綜理《逸周書》、《左傳》、《史記》和《穀梁傳》的線索，可知召公與姬姓周人系出同源，有一定的血緣關係。至於召公為文王之子、周公之兄的說法到東漢時才出現，見於《白虎通義》和《論衡》。由目前可見的資料推測，「文王之子」說一方面可能受周初重臣多與文王關係密切影響，另一方面可能是儒者誤讀《穀梁傳》「分子」為「出分子」的結果，之後又結合太姒所出十子的記載，發展出「文王庶子」說。王充一方面受「文王之子」的啟發，可能又受《尚書·君奭》異文影響，有召公為周公之兄的說法。

揆諸先秦以至西漢的記載，召公與周王室的合作雖然緊密，但沒有任何文獻曾說召公屬文王家族。反之，《尚書》中周公對召公說話的口氣與態度有著微妙的距離，再加上召氏銅器的殷商文化特徵，⁶³「文王之子」以及由此衍生的「周公之兄」說，可信度大概不高。

⁶³ 出土材料顯示西周時期召氏以外的姬周族群也偶見使用「日名」、「族氏銘文」等被視為非周文化的習俗，如周公後裔的應國。案例少，當是特殊個案，因此不宜一視同仁論之，宜以個案處理。本文僅論召公一系，其他案例待日後為文論之。

召公身分在傳統文獻中的曖昧不明，以及青銅器上呈現的與周人文化的差異，是如韓巍所說，召公本是異族，因功賜姓，還是如任偉所言，本是周的一支，後來回歸呢？本文參考西漢以前文獻的通說，傾向於後者的解釋。首先，周人因功賜姓一說未有其他佐證；⁶⁴ 其次，周大夫富辰說召公可以糾合宗族，則召公應為姬姓周人；其三，《左傳》記有「大戎狐姬」、「驪姬」，戎人也有姬姓。⁶⁵ 周人先祖曾竄於戎狄間，原為同血緣之周族，在輾轉遷徙而分族別居後，致使文化差距很大，揆諸情勢並不奇特。召公家族的文化特色足以顯示他們曾經離開過周人本支，後又返回加入周人的政治事業，以周初召公與周王室密切合作看來，召氏回歸不會晚於文王時期。


召公一族在文獻與考古資料中呈現的面貌相當複雜，這提示了商末周初以周人為首的政治集團組成與文化的豐富多元，簡單的分類與歷史解釋很難得到令人滿意的答案。惟有從寬考量各種可能性，才可能更貼近周初歷史的真貌。

本文主要論點是召公與文王家族的關係有時間越後，說法越清晰的現象，但筆者並不認為這是古史辨運動所主張的漢人刻意創造，而是漢代學者對古代史的分析與詮釋造成。漢代首次展開對古代知識的全面整理，統整散亂無章的圖書卷帙，古代典籍因而依漢人的理解，被編入一套知識體系，漢人也從中得出一幅古代史圖景，從而形成今日我們所認知的古代史。這並非指古代史全由漢人創造，而是漢人試圖以當時有限的知識碎片拼湊古代史曖昧不清處，由此產生的解釋流傳至後世，形成了後代認識古代的基礎。故出土資料與傳世典籍往往有矛盾，除了異說之外，部分肇始於漢代學者的歷史解釋。因此，在運用傳世典籍與出土資料之前，首先應注意傳世典籍的資訊累加與修訂遠過於出土資料，運用傳世典籍前應盡可能釐清典籍的特性、資料來源等資訊，以免在有疑處增添疑慮。

本文並非要運用所有相關資料討論召公的出身，而是分析學者習於引用的「文

⁶⁴ 學者因《左傳》「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主張周代曾有賜姓之事。陳絜認為周初的封建伴隨著賜姓，所謂「因生以賜姓」是依血緣賜姓，韓巍則認為賜姓是為了吸納有功異族入周，如召、南宮、榮。《左傳》眾仲答魯隱公問命氏，是對古代命氏制度的總結，難以落實到具體時間；且文獻上沒有賜姓的實證。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238-255。

⁶⁵ 李零曾整理史籍關於戎狄的記載，戎、狄都有姬姓。李零，〈太行山與燕山南北——說京津冀地區及周邊的古代戎狄〉，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50-51。

王之子」、「周公之兄」等說法產生的過程，指出諸說不可信之處，作為日後討論召公出身的基礎。學者因而可以先排除特定框架帶來的限制，不再囿於既有成說，得以用更寬廣的視角檢視青銅器這類當世所造，未經後世改動的資料，對周初的政治有更豐富的想像。

附表：召公出身歷代記述論辨通表

周之同姓說（含「黃帝之後」）

編號	書篇	內容要略
1	〔西漢〕司馬遷 《史記》，〈燕 召公世家〉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
2	〔東漢〕班固 《漢書》，〈古 今人表〉	召公，周同姓。
3	〔唐〕孔穎達 《毛詩正義》， 〈甘棠〉	〈燕世家〉云：召伯奭與周同姓，是姬姓，名奭也。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未知何所據也。
4	〔唐〕孔穎達 《尚書正義》， 〈君奭〉	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
5	〔唐〕陸德明 《經典釋文》 卷 13，〈禮記 音義之三〉	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也。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國祖邵公，與周同姓。案：黃帝姓姬，君奭蓋其後也。或黃帝之後封薊者滅絕，而更封燕郡乎？疑不能明也。而皇甫謐以邵公為文王之庶子，記傳更無所出。又《左傳》富辰之言亦無燕也。
6	〔清〕顧炎武 《日知錄》卷 31，〈薊〉	禮記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原注：史記及水經注並云，堯後。疏云，今涿郡薊縣是也。即燕國之都。孔安國、司馬遷及鄭皆云燕祖召公與周同姓。按黃帝姓姬，召公蓋其後也。原注：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也。」皇甫謐因謂召公為文王之庶子。而范甯註又以為成王所封。然考左傳富辰之言，不敘及燕。按，此以薊燕為一國，而召公即黃帝之後。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帝堯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正義曰：「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薊燕二國俱武王立，因燕山薊丘為名，其地足自立國。後薊微燕盛，乃并薊居之。」其說為長。
7	〔清〕朱彝尊 《曝書亭集》 卷 33，〈報徐 敬可處士書〉	辱示春秋地名考，采擇羣書，援據精確。嘗惜鄭樵之譜、張洽之表、徐得之之記，未寓於目，足下書成，可以無憾矣！以僕蒙滯，安能有所是正？惟於召公封國，注從《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鄙意不能無疑。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既以召公為文王子，乃欲并原豐為一，穎達已斥其謬，然則宜存皇甫之說，而駁正之者也。至足下謂燕初封未得薊，以僕考之，燕之始封，本都於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逸齋《詩補傳》云：「薊後改為燕，猶唐之為晉，荆之為楚。」惟因記有封黃帝後于薊之文，而史記既封帝堯之後于薊，

		又封召公奭于燕，燕之于薊若分二國。於是張守節則云，召公始封在北平無終縣，以燕山為名，後漸強盛，乃并薊，徙居之。王伯厚則疑黃帝之後封于薊者已絕，成王乃更封召公于薊。之二說者，僕益疑之。惟陸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觀於是而僕之疑始釋也。蓋公既為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軒轅二十五宗，堯之後亦黃帝之後，於褒封先聖王之後則稱薊，於封功臣謀士則稱燕，以采邑言則稱召，薊與北燕本一而已。足下以為然乎？否乎？惟再示之。
8	〔清〕馬瑞辰 《毛詩傳箋通釋》卷3，〈甘棠〉	甘棠。《序》：「甘棠，美召伯也。」《箋》：「召伯，姬姓。」《釋文》：「〈燕世家〉云：『與周同姓。』孔安國及鄭皆云爾。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未知士安之言何所憑據。」瑞辰按，《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此蓋士安所本。但據《樂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理志》云：「薊，故燕國。」是召公封薊，即為燕，此正召公為黃帝後，非文王子之證。

周之分子

編號	書篇	內容要略
9	《穀梁傳》莊公三十年	燕，周之分子也。
10	〔東晉〕范甯 《春秋穀梁傳集解》，〈莊公第三〉	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
11	〔唐〕楊士勛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6，〈莊公〉	燕是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者，世家文也。分者，別也。燕與周同姓，故知別子孫也。
12	〔南宋〕裴駰 《史記集解》引譙周說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
13	〔南宋〕鄭樵 《通志》卷26，〈氏族略〉	燕氏。北燕也，舊幽州薊縣是也。南燕今滑州胙城是也。召康公奭，周之支族，食邑於召。武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
14	〔南宋〕洪适 《隸釋》卷15，〈義井碑陰〉	右〈義井碑〉陰，稱五大夫者三十一人，稱分子者六十人，摩滅者數人。題名之下又有數十字，蓋是紀事之辭，殘缺無成文者。漢承秦制，爵二十級，其九爵曰五大夫。《帝紀》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緹騎營士；又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則知漢末以貲受爵，比屋皆然，此碑五大夫所以若是之眾也。惟分子未詳。《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注云：「燕，召康公之後，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景北海碑〉：「鷗鼻不鳴，分子還養。」蓋用「家富子壯則出分」之語，謂惡逆之鳥，鉗喙無聲，外爨之息，

		歸奉三牲也。〈耿勲碑〉：「脩治狹道，分子効力」，謂正丁巳供差徭，分子亦來助役。此碑分子似指土豪出分之子，三碑皆與《穀梁》合。
15	〔清〕馮桂芬 《顯志堂稿》卷 2，〈無錫吳氏 族譜序〉	《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別子有三，一，諸侯嫡子之弟為公子者；一，異姓公子來自他國，鄭《大傳》注所謂「始來者」也；一，庶姓崛起為卿大夫，鄭《王制》注所謂「始爵者」也。三者皆名別子，而以本國公子為最貴，不獨可統不為別子者，並可統他國之亦為別子者。武王以母弟周公為昆弟宗，故魯為諸姬之宗國。《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注謂：「周之別子孫。」《史記》云：「衛，周之別子。」皆以本國為主之證。明乎燕、衛不可以統魯，而魯可以統燕、衛。
16	〔清〕簡朝亮 《尚書集注述 疏》卷 22，〈君 奭〉	《史記·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繇今考之，僖二十四年《左傳》言文王之子凡十六國，不言燕也。莊十三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蓋《禮·大傳》所謂「別子為祖」者歟。《論衡》云：「召公，周公之兄」，非也。〈君奭〉稱名，非弟所以稱兄也。
17	〔清〕劉寶楠 《愈愚錄》卷 3，〈分子〉	分子。《穀梁傳》：「燕，周之分子也。」范甯注：「分子，謂周別子孫也。」陸德明《音義》：「分，本或作介。」姚氏鼎云：「分子當是別子，古別字作𠂔，故傳本或作分，或作介，皆以古字形近而誤。」范甯時傳本未誤，故注云：「調周別子孫也。」唐以後，其文舛失，故疏解失之。案：分子即別子，不必改字作𠂔。范注明言分子，無從知范本為別子。《史記·楚世家》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召五分子齋而入；漢《北海相景君碑》：「鷦鼻不鳴，分子還養。」分子當調庶子，洪氏謂此用「家富子壯則出分」之語。〈武都太守耿勲碑〉：「修治狹道，分子効力」；又，〈義井碑〉陰題名稱分子者六十人，洪氏謂似指土豪出分之子，解分字太泥皆作分字。豈亦形近之誤耶？姚說非。
18	〔清〕李富孫 《春秋三傳異 文釋》卷 12	卅年傳：「周之分子也。」《釋文》云：「分，本或作介。」案，注云：「分子調周之別子孫也。」《莊子·漁父》，《釋文》：「分本作介，介、分字形相似。」介子為貴介也，亦通。
19	〔清〕毛奇齡 《西河集》卷 12，〈又奉史 館總裁劄子〉	《禮》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別子者，人君之弟之名也。別者，分也，所以分于人君也。《穀梁傳》曰：「燕者，周之分子也。」
20	〔清〕沈欽韓 《漢書疏證》卷 6，〈召公〉	〈燕世家〉云：「與周同姓。」皇甫謐云：「文王庶子。」蓋據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然分子不必定屬文王之子。
21	〔清〕王鳴盛 《尚書後案》卷 22，〈君奭〉	《傳》以君奭為周同姓，《疏》言非文王子，又引皇甫謐說駁之者。考謐以奭為文王庶子，見《詩·甘棠》疏。《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召公，文王子。」王充則曰：「召公，周公之兄。」然《史記》但云同姓，則非文王子。《史記》所述世系據《世本》，《世本》出晚周，是秦火以前，書為可信。莊三十年《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或出太王，或出王季之別，皆未可知。楊士勛疏亦用《史記》同姓之說。鄭于〈甘棠〉

		箋云：「召伯，姬姓，名奭。」是非文王子也。
22	〔清〕王鳴盛 《蛾術編》卷 49，〈說地〉	陸德明謂：「黃帝姬姓，君奭蓋其後也。」此說非是。《春秋穀梁傳》云：「燕，周之分子也。」范注：「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或出太王，或出王季。班固、王充、皇甫謐則以為文王子。譙周則以為周之支族。富辰叙文昭十六國，雖不數燕，然云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則必至戚也。德明特借姬姓二字以附合黃帝之後耳。
23	〔清〕張尚瑗 《三傳折諸》， 《穀梁折諸》 卷2，〈桓公〉	燕，周之分子也。《白虎通》言召公為文王庶子，而富辰述文之昭十六國，獨不及燕。《穀梁》以為「周之分子」，殆與班氏同指。范武子注《穀梁》之時，左氏之書盛行，故曰成王所封分子者，周之別子孫也。愚以為召康公留輔王室，顧命、康王之誥可考。後裔穆公虎歷相厲、宣，《左傳》戴公、莊公皆稱召公名，無替厥職，與周公黑肩、周公忌父皆世為周卿士，其居北燕者，乃康公之分子。
24	〔清〕顧棟高 《春秋大事表》卷11，〈春秋列國姓氏表〉	北燕《史記》〈燕世家〉：召公，周之同姓。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按：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一十六國，召公不與焉。然其下云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似為周之近族。《穀梁傳》亦謂「燕，周之分子」。則皇甫之言未為無據也。朱竹垞以為堯後，引《史記》封帝堯之後于薊，謂燕之始封本都于薊，故班固曰「薊，故燕國，召公所封。」蓋堯祖黃帝，故《記》又云「封黃帝後也」。陸德明亦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二者未知孰是。

文王之子說（周公庶兄說以*標示）

編號	書篇	內容要略
25	〔東漢〕班固 《白虎通義》， 〈王者不臣〉	《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
26	〔東漢〕王充 《論衡》，〈氣壽〉*	邵公，周公之兄也。
27	〔西晉〕皇甫謐 《帝王世紀》	文王庶子。
28	〔清〕惠棟《九經古義》卷15，〈穀梁〉	卅年《傳》：「燕，周之分子也。」分子猶別子，《禮記·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王所生者為王子，謂之別者，別于世子也。〈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譙周曰：「周之支族。」孔穎達以為譙周考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以為文王庶子。《白虎通》云：「召公，文王子。」王充曰：「召公，周公之兄。」《穀梁》以為分子者，蓋長庶歟！
29	〔清〕左暄《三餘偶筆》	《穀梁傳》曰：「燕，周之分子。」「分子」者，猶《曲禮》之言「支子」，《大傳》之言「別子」也。《逸周書·作雒解》：「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祭公解〉：「王曰：『我亦維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此召公為文王子之確證。《白虎通》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則召公為文王子，漢人已

		明言之。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蓋本穀梁氏「燕，周之分子」，故云然，非無據也。司馬遷云：「召公與周同姓。」按《史記》於畢公亦云「與周同姓」，亦可謂畢公非文王子哉？
30	〔清〕周炳中 《四書典故辨正》卷7，〈召公奭〉	《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而《白虎通》以召公為文王子。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王充亦云：「召公，周公之兄。」考《春秋傳》富辰稱文之昭十六國，而燕不與，故後人多疑其無據。愚謂古史殘闕，衆說兩岐，則當考之於經。經雖無明文註記，而辭旨顯白，亦可斷之以理。自古貴戚之與異姓異，貴戚中同父又與同姓異，伊尹作〈保衡〉、〈伊訓〉、〈太甲〉諸篇，稱湯以訓曰「商王」、曰「先王」、曰「俾輔于爾後嗣」、曰「辟不辟泰厥祖」、曰「今王嗣有令緒」、曰「臣罔以利居成功」，皆異姓之辭氣也。召公誥成王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知今我初服」，又曰「我受天命」，其辭氣與周公之告孺子王如出一口。周公語君奭，于文武曰「前人」，于成王曰「小子」、「冲子」，于己與奭曰「我二人」，曰「予暨汝其濟」，曰「前人悉命汝」，其辭氣明明父子兄弟，不但同姓而已。然則班氏、皇甫氏之說，殆其然與！

文王從子說

編號	書篇	內容要略
31	〔清〕孫星衍 《尚書今古文注疏》，〈君奭〉	《史記》但云與周同姓，《穀梁》莊十三年傳云：「燕，周之分子也。」注云：「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禮·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謂公子。」然則是文王之從子。傳載文王之子無名「奭」者。

其他

編號	書篇	內容要略
32	〔清〕皮錫瑞 《今文尚書考證》卷21	《白虎通》不臣篇曰：「召公，文王子也。」《論衡》氣壽篇以召公為周公之兄。《穀梁》莊三十年傳曰：「燕，周之分子也。」惠棟說：「分子猶別子，《禮·大傳》云：『別子為祖。』」注云：「別子為公子。」然則繼體者為世子，別於世子者為別子。則召公其文王長庶歟！」錫瑞謹案曰：《白虎通》、《論衡》皆今文家說，蓋今文家有以召公為文王子者。而《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古今人表〉亦云：「周同姓。」不以為文王子，其說不同，蓋亦三家之異。
33	〔清〕杭世駿 《續禮記集說》卷61，引 〔北宋〕陳祥道（用之）	《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34	〔清〕陳壽	陳喬樞補引《漢書·古今人表》「召公，周同姓。」又引《漢書·高惠

祺、陳喬樅 《齊詩遺說考》卷1，〈甘棠〉	文侯表序》：「至其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案語云：喬樅謹案：《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引《詩》「文武受命，召公維翰」，以召公為文王子，則是出魯詩也；孟堅此表序燕齊並稱，明不以召公為文王子，是據齊詩之說。
-------------------------	--

徵引書目

一、古籍（按朝代先後次序排列）

- （西漢）孔安國，《尚書》，四部叢刊景宋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西漢）毛亨，《毛詩》，四部叢刊景宋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西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西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宋慶元黃善夫刊本影印。
- （東漢）王充，〈氣壽篇〉，《論衡》，四部叢刊景通津草堂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東漢）班固，〈賈誼傳〉，《漢書》，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5月4日。
- （東漢）班固，《白虎通德論》，四部叢刊景元大德覆宋監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臺北：鼎文書局，1986。
- （東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白虎通義》，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 （東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73，據校相台岳氏本影印。
- （西晉）孔晁，《逸周書》，四部叢刊景明嘉靖二十二年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12日。
- （東晉）范甯集解，（唐）陸德明音義，《春秋穀梁傳》，四部叢刊景宋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東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清）阮元校勘，《重刊宋本穀梁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影印。
- （東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影印，卷6，〈莊公〉，頁64。
- （南北朝）范曄，（唐）李賢等注，〈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後漢書》，百衲本景

- 宋紹熙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5月3日。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清抱經堂叢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 （宋）洪适，《隸釋》，四部叢刊三編景明萬曆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 （清）皮錫瑞，《今文尚書攷證》，清光緒刻師伏堂叢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清）阮元，《三家詩補遺》，清儀徵李氏刻崇惠堂叢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
- （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清平津館叢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 （清）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清）陳逢衡，《逸周書補注》，清嘉慶-道光間江都陳氏裊露軒刊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0年3月12日。
- （清）陳壽祺、陳喬樞，《齊詩遺說考》，清刻左海續集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2日。
- （清）惠棟，《九經古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 （清）簡朝亮，《尚書集注述疏》，清光緒讀書堂刻本，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位化技術研究中心，2005。最後檢索日期：2021年3月23日。
- （日）山井鼎撰、物觀補遺，《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二、專書

- 于省吾，《雙劍謠尚書新證》，臺北：崧高書社，1985。
- 任偉，《西周封國考疑》，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1986。
- 周玉秀，《《逸周書》的語言特點及其文獻學價值》，北京：中華書局，2005。
- 屈萬里，《尚書異文彙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
- 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華岡出版部，1972。
- 徐元誥，《國語集解（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 陳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
- 程元敏，《先秦經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 程元敏，《尚書周誥十三篇義證》，臺北：萬卷樓，2017。
- 黃懷信，《《逸周書》源流考辨》，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2。
- 楊筠如著，黃懷信標校，《尚書覈詁》，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5。
- 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

三、期刊論文

（一）中文

- 王暉，〈從數詞組合方式的演變看先秦古籍的斷代問題〉，《唐都學刊》，第4期（1996），頁62-67。
- 李零，〈太行山與燕山南北——說京津冀地區及周邊的古代戎狄〉，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29-52。
- 李學勤，〈祭公謀父及其德論〉，《齊魯學刊》，第3期（1988），頁78-10、7。
- 杜勇，〈清華簡《祭公》與西周三公之制〉，《歷史研究》，第4期（2014），頁4-20、189。
- 沈建華，〈清華楚簡《祭公之顧命》中的三公與西周世卿制度〉，《中華文史論叢》，第4期（2010），頁379-404。
- 芮逸夫，〈釋兄弟之國——兼論中國古代諸父的稱謂〉，《清華學報》，新2卷2期（1961），頁77-90。
- 芮逸夫，〈釋甥舅之國——兼論中國古代甥舅的稱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0本上冊（1959），頁237-258。
- 張懋鎔，〈周人不用日名說〉，《歷史研究》，第5期（1993），頁173-177。
- 張懋鎔，〈周人不用族徽說〉，《考古》，第9期（1999），頁835-840。
- 郭維茹，〈今文《尚書》「惟」字分裂句初探〉，《臺大文史哲學報》，第85期（2016），頁135-174。
- 趙光賢，〈《逸周書》作洛篇辨偽〉，《文獻》，第2期（1994），頁267-269。
- 關小彬，〈白虎通義引《詩》、說《詩》考〉，《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2008），頁33-36。

(二) 日文

(日) 杉村伸二,〈前漢景帝期國制轉換の背景〉,《東洋史研究》,第 67 卷第 2 期 (2008),頁 161-193。

四、專書論文

李零,〈太行山與燕山南北——說京津冀地區及周邊的古代戎狄〉,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29-52。

白川靜,〈召方考〉,《甲骨金文学論集》,京都:朋友書店,1973,頁 171-203。

李學勤,〈師詢簋與《祭公》〉,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 22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70-72。

李學勤,〈清華簡《祭公》與師詢簋銘〉,楊朝明主編,《孔子學刊》,第 2 輯,上海:上海古籍,2011,頁 12-134。

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日名說」〉,《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3 輯,北京:科學,2010,頁 23-26。

張懋鎔,〈再論「周人不用族徽說」〉,《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 3 輯,北京:科學,2010,頁 27-30。

五、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最後檢索日期:2021 年 3 月 24 日。

雷燮仁,〈《尚書》字詞零拾〉,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3145>),最後檢索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六、學位論文

韓巍,〈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7。

(責任編輯:董百坊)